

福音教会与社会责任（二）

徐志秋教授

今天是上一次我分享内容的续集，我先把上一次的内容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可能在线上的一些牧者，朋友上一次没有参加。这个主题是福音教会与社会责任，实际上这是一个对福音教会非常贴切的题目。

（一）回顾上一讲和时代的紧迫性

福音教会主要指的是近现代以来在欧美发展起来的一支信仰纯正的、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支系，是在基要主义与自由主义两者的张力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现代神学。它在形成的过程中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或者很重要的缺陷就是它把社会参与或者社会服务意识割让给了社会福音主义，或者叫社会福音神学。纽约的一个神学院教授饶申布什 Walter Rauschenbusch 主张社会神学，他写了一本书《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但是因着一些因素产生了一些历史误会。福音本身带有社会服务的层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去关怀贫穷的人，要我们做盐做光，这就是在社会服务的层面社会参与的意识。传统的或者新教的神学理念也都是在政治理念或者社会公共领域里面因着教会的参与对社会的改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比如加尔文的日内瓦就跟社会制度的改良有关以及后来飘洋过海到美国建造的第一个殖民地对美洲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巨大，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影响在基要派跟自由主义神学或者现代神学的斗争的张力过程中慢慢地流失了，使得这个福音性收缩到教会以内，对社会的事务不参与不过问，以至于在学术、政治、科学、社会服务领域基本上就不发声。

这种现象也影响到了中国的教会，1920 年至 1940 年基要主义跟自由派之间残酷激烈争战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宣教工场受到欧美的影响大概晚了十来年，所以在 50 年代初期的时候开始感受到基要主义跟自由派之间的张力，这个使得当时的中国教会开始在教会的层面反思。我不知道这个是有幸还是不幸，就是 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跟这个外国的差会之间或者是西方传教士的联络被强行的人为的被动的切断，而在 1951 年以后开始三自改造，成立三自教会，然后家庭教会转入地下，所有的海外宣教士被驱赶出境。这样，就中断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在西方福音教会处在基要派跟自由派之间长久的分裂或者张力里，但是事实上它却以另外一种的形态在中国被保存了下来。比较简单的来讲就是家庭教会承袭的是基要主义的那条路线，三自教会承袭的是社会福音主义或者是比较自由派的那个传统。1951 年代一直到今天，三自跟家庭教会之间的张力就是一个附带的损伤，家庭教会日益只关注教会内部的事务不关注社会事务，他们认为所有的社会参与都是自由派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处在地下的状态没有机会发声，另外就是给他们

发声的机会，他们也是瘫痪的，他们是没有能力、没有动机、没有愿望参与社会。要在社会上发声他们受到神学本身的限制，这个限制就是基要主义这一支。

1960 年代以后在西方新福音主义的兴起以及后来的洛桑运动的开展，使福音教会开始意识到社会残留的问题，但是因为中国的家庭教会跟西方教会的割裂，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还停留在 51 年之前的基要主义的传统特色里。即便将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家庭教会一个平台让他们去参与让他们去发声，他们发出来的可能也是非常幼稚的声音，或许是本身对社会参与就抱了一种敌意或者拒绝的心态，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日益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原本我估计未来的十年间中国的家庭教会有机会浮出水面或者可以对社会发声，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有机会他们也不愿意发声、或者没有声音可发、或者没有成熟的声音可发，那么就失去了向社会做见证的机会，这种机会可能过去了以后的几十年不会再来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议题在一个非常急切的当口。

当我们检视中国教会信仰传统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的教会事实上受西方传教士很多的影响像马礼逊，戴德生，这些影响在基因里带着一定的特色或者缺陷，这种缺陷是由于当时的欧美教会在一种争战的状态里面比较容易走极端，这种极端的特色就带到了中国的教会里面。而我们一直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一直蛰伏在里面、一直潜藏在里面、一直没有发挥出来，处在地下状态的时候不是很明显，一旦将来进入参与社会、进到社会公众广场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天然的缺陷。那么，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二）福音派在中国的大撤退：现代派和基要派之争

今天进入第二部分，福音派在中国的大撤退或者是福音派在中国的社会参与意识是怎么慢慢的流失。因为它承袭了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基要主义的传统特色，事实上在美国基要主义进到中国之前，有另外一支以李提摩太代表的自由派，也不一定完全是自由派，只是他们受到自由派的很多影响抱着一种 progressive（推从改变）的观念，在晚清、民国的时候他们对社会的参与却是波澜壮阔，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也是非常的巨大。他们不属于家庭教会的传统，不属于家庭教会的思路，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历史的遗产衔接起来，把这个基因缺陷改正过来，希望今天在线的各位牧者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而有意的进行调整。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这个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对未来的中国教会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影响都会是非常正面的。

那么西方的基要主义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哪里呢？主要是集中在家庭教会，而基要主义对中国家庭教会获得非官方教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谁呢？主要是通过王明道先生，而基要主义的急先锋是时代主义。时代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通过的管道是倪柝声弟兄，现在我们很粗线条的梳理一下这两条路线。

王明道先生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檄文“我们是为了信仰”，今天我们一听到这篇檄文会认为这是家庭教会在 51 年三自爱国运动之前的一篇政治的檄文，表明政治立场不与官方合作。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为了信仰”是一篇神学立场的檄文，是一篇基要主义的神学宣言，不是一个政治宣言，一直以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偏差。王明道先生提到现代主义也就是社会福音主义或者是自由主义主要反对的是基要主义，我们信仰的传统是基要主义，前者代表的是进步思想而后者则代表保守思想。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这两派思想所争执的主要有五点，这个也是王明道先生总结出来的。

第一点是关系圣经的本身。基要派认为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而因此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现代派却根据圣经批评(Higher Criticism)的方法，认为圣经不是一本一字不错的科学和历史的教科书，而只是信仰和生活的一个可靠的指导。圣经所包括的时间达一千年之久，在这个长时期中，如果说传说和记录，一点没有错误，那是不可想像的。基要派认为人是上帝“超自然”创造的结果，而现代派则接受了天演论的说法，认为人是自然演进而成的，甚至可能是由猿猴演变而成的（王明道文库第九卷）。王明道先生在这个地方说得非常清楚所承袭的是什么，是基要主义的神学立场，而所贬斥只是一个陈述还没有完全清楚地表明立场，但是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泾渭分明和现代自由主义之间是格格不入的。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二个题目是耶稣降世的问题。基要派认为耶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是由童贞女怀孕而生的，而现代派则认为童贞女生耶稣这个故事，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寓言看。这种对圣经的自然化的解释、道德化的解释、寓意化的解释是“耶稣传”里非常清楚的一种记载的特色。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三个题目是赎罪问题。基要派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替人赎罪的挽回祭，它把上帝对人的忿怒，变成上帝对人的饶恕；但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却认为十字架只是显示了上帝慈爱的能力，我们因为这爱，就能与上帝成为一体。我们并不必相信一个忿怒的上帝，要求一种救赎的代价。这个也是尼泊尔所说的，现代派所相信的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上帝、是一个没有愤怒的上帝、是一个没有审判的未来，进入到一个不需要十字架的没有基督的天国，这个就是王明道先生反对的基要主义的神学立场。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四点是复活的问题。基要派相信耶稣的肉体复活是必需的，否则耶稣就没有胜过死亡。现代主义者并不否认复活，但他们认为复活不一定是肉体的复活。现代主义者认为是否相信肉体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也就是说他们虚化了十字架，虚化了基督的复活，也因此虚化了整个基督信仰的根基，因为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基督复活事件是整个信仰的核心事件。

两派争执的最后一点是关于耶稣的再来。基要派相信耶稣马上就要驾着云彩，以肉身再度降临世界，而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耶稣再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象征着正义的征服罪恶。其实神学对于基督再来的解释有非常不同的解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明

道先生所承袭的恰恰是基要主义的最本质的神学特征，它在信仰传统上面是非常保守的，这个也是福音派的一个核心的信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 4 节到第 7 节里面讲了最原始的福音，而那个福音的宣言有人认为是复活节之后就已经形成的一个信仰宣言，大约公元后 31 年很多神学家认为那个信条就叫做 kerygma。那个是福音的原初信息，而基要派对那个信息是没有打折扣的，所以他们的信仰教育完全是正统。

王明道先生说：“这就是现代派的信仰！这就是现代派的真相！我称他们为‘不信派’，是不是冤枉他们？是不是对不住他们？”我们这里很清楚的看到老先生的语气，他的答案。王明道先生的这个观点其实与 1929 年普林斯顿神学院一批教授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那时，以梅钦教授 John Gresham Machen 为代表和一些教授，他们离开普林斯顿神学院，创立了费城西敏斯特神学院。在那个时候梅钦写过一本书叫做《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基督教与自由主义)。这一本书的玄机就在这个书的名字。他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基督教的另外一种的信仰或者是另外一种的异教的信仰，跟基督教不是一回事，不属于基督教，所以他在书的名字中特别把这两个词比列出来。这是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在这个书名表现得很清楚。王明道也同样认为，现代自由主义不是基督教，是不信派。

前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君所写‘耶稣传’，就是一本中国现代派典型的著作。上海青年协会书局所出版的关于基督教的书籍，绝大部分是现代派所写的。吴(耀宗)君也告诉我们说，‘现代派的健将则是纽约协和神学教授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富司迪在基要派与自由派之争中，他是自由派的健将。吴君又告诉我们说，‘富司迪的名字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他的几本名著已由青年协会书局翻译出版的有“完人的模范”、“信仰的意义、”“祈祷的意义”、“服务的意义”、和最近出版的“明经指南”。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自由派的思想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气候，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王明道先生奋起反击。在那个时候王明道先生认为对中国的教会，当时还没有家庭教会，冲击最大威胁最大的不是新的政权而是自由主义神学或者现代神学。这个就是当时基要主义这一条支线的特色，通过王明道先生进到了中国。现在中国家庭教会基本上承袭了这一条路线。

(三) 福音派在中国的大撤退：时代主义的影响

那么，时代主义是通过谁传到中国的呢？通过小群，更确切的说是通过倪柝声弟兄传到中国的。倪柝声年轻的时候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在生病，他在生病期间读了大量的时代主义的书籍，甚至把司可福函授课程翻译成了中文。倪柝声弟兄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过目不忘，他的英文写作能力以及他对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粗通使得他可以绕过一些翻译的文字直接进到原文里面去探索，但是他对原文的熟悉程度不深，以至于有时候他以为是很准确的根据原文的结论是比较片面的，比较碎片化。

倪柝声年轻的时候阅读过达秘（J.N.Darby）的解经书以及司可福圣经注释。达秘是时代主义的创始人，而司可福的圣经注释是时代主义的最畅销的或者是影响最远的一本书，所以可以看见他自己本身所受的影响以及翻译过后的文献对中国教会所造成的影响。1930年代初期他同史百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将他称为自己最敬仰的弟兄，史百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时代主义。同一阶段，倪柝声还拜访了伦敦的弟兄会，与他们大量的通信，而达秘是弟兄会的领袖人物。倪柝声跟这些时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分享风行一时的时代主义，最后这个时代主义来到了美国，驻扎的大本营主要的代表就是达拉斯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现在也比较去时代主义，但是今天在传统上仍然拥有时代主义的特色。

同时，倪柝声的三元论也抑制了教会对社会参与的意识。倪柝声身把人分为灵、魂、体，他对“魂”贬抑与敌视，在群体和社会的层面，演变成对所有“非属灵”的事物习惯性地排斥与否定，而这些魂界的领域包括科学、艺术、教育、政治、哲学等等文化使命的几乎全部的内容。受这种思想熏陶的基督徒，所关心的只是与自己的“魂”作斗争，与社会的“属魂”的领域排斥与抵制，成为不关心社会公义、流离于发明创新或社会公益之外，潜意识拒绝参与公共领域，对社会时政、教育科研、发明创新、分配正义、制度优化、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等公共议题冷若冰霜，即便偶尔有这方面抱负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成圣框架下也会收到压制批评、冷嘲热讽，甚至被无情打压。基督信仰的公共性会受到严重戕害；即便基督徒人口比例迅速增加，也难以对社会整体形成相应的光盐效应。倪柝声三元论包含着反智、反文化的倾向。

（四）近代教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那么，另外一条线自由主义神学是通过三自爱国主义运动进入到中国。三自爱国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主义运动叫做 christian socialism 就是基督徒的社会主义者。所以饶申布什博士当时在南美洲或者欧美吸引了大批的 Christian socialism，它是基督教跟马克思主义天然的结合。纽约协和神学院士当时是 social gospel 或者是 christian socialism 的重镇，原先跟哥伦比亚大学是同一个学校，后来神学院分离出来以后就成了纽约协和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对民国时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影响非常的大，当时宋向节进到这个神学院里面学习然后受到圣灵的恩膏浇灌充满，被当做疯子关到疯人院的那个神学院。当时燕京大学教授中许多人毕业于这个神学院，其中包括徐宝谦、简又文刘廷芳等。三自的发起人吴耀宗也毕业于协和神学院，丁光训是协和的神学硕士。三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社会福音主义与共产革命的真诚结合。

中国家庭教会基于对现代自由神学的排斥，以及对三自爱国运动的疏离，由此产生对福音社会性一面的双重隔膜再加上家庭教会长期处在地下状态，并不允许明确的社会关怀，因此形成今天与主流社会相互隔离的状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与此同时，受到现代自由派影响的清末及民国的宣教士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改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当然也有许多保守信仰背景的宣教士参与了社会改良，这些人包括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与他们相对的是戴德生等专注福音与教会。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这一支系，在医疗、大学、新闻、体育、科技、慈惠事业等方面，对中国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而另一支系在 1949 年以后就中断了，是因为后来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改造以及对宣教士的驱逐，而基要主义对中国的影响通过家庭教会为载体就一直流传了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中国的教会目前缺少社会参与是有一个历史渊源在里面。

接下来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民国宣教士对中国社会关怀的医疗方面，当时有很多的医院都是宣教士开创的，还包括了一些高等教育，这些教会大学所培养的人才比现在所有的中国大学加起来培养的人才都要多。当时这些教会很小，燕京大学存在近 33 年，在校生从未一次超过 1000 人，相当于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大学，却为中国培养了优秀的人才，在今天的两院院士中燕大学生有 52 人。中国真正的新闻事业，体育事业都是从宣教士开始的，自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后，宣教士发起了禁缠足运动，禁烟运动，在体育、科技领域一些民国杰出的人物也都是教会培养出来的。

这就是我今天主要分享的基要派与社会福音主义在中国的起承转合以及它们的承袭，和另外一支系的消亡情况，也探讨了我们在传承的基因方面家庭教会存在哪些缺陷和我们需要觉醒的地方。

讨论时间：

Q: 可以请您分享一下从 1950 年到现在的 70 年间，自由派和基要派，时代主义这三者之间的发展情况吗？

A: 70 年以后或者 79 年以后家庭教会的兴起，三自教会逐渐复堂，事实上跟以前的时代都有断档，从一定的角度来看，接下来的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就是诸位牧者所书写的历史。上一次戴牧师黄磊牧师所讲到家庭教会的参与，这个不是新的篇章。其实社会参与意识的觉醒是在新福音派所发起的洛桑运动，洛桑会议开了三次，会议一直邀请中国家庭教会参加，但是很遗憾第一次是因为文革，第二次是因为 89，第三次为中国教会保留了 200 个名额为什么没去成的话就不用我多说了。

Q: 我看到一个数据,74 年洛桑会议的时候他们将社会关怀重墨的提出来，而在第二次洛桑会议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在 74 年之前 95%的社会关怀是由自由派神学立场的教会参与的，福音派只占到 5%，而在 89 年之后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福音派占到了 90% 以上，这个可能是因为 74 年的洛桑会议之后形成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徐教授有没有看

到这样一个数据？在北美的情况是怎样的？我几年去美国时发现很多非盈利性的组织都有教会背景，但现在基本都去教会化了。

A: 这是一个事实的状况。对于社会的参与福音派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在 74 年的洛桑会议之后一批有影响力人的开始觉醒，进行大量的宣传和传递异象以后教会有很大的改观。其实刚才所讲的这一条线一直在正统信仰里面，那么一旦激活以后重新活过来随即产生很大的影响，福音派的体量很大，一旦大家开始意识到参与以后一下子就翻转过来。而自由派神学它只是一种理念它的教会的根基非常的薄弱，随着自由派的势微影响力就急剧下降，以前所创立的这些机构福音的色彩基本上就没有了，信仰的影响也很淡化了，很典型的就是救世军，和基督教青年会 YMCA。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要在社会参与意识上重新觉醒、崛起的话，我们要注意福音信仰本质或者信仰基因的坚守与社会参与的这两条线，都要抓得紧紧的不能够放掉，其中一个放掉都是没有出路的，这个是我们观察过去的八十年间里面西方世界的教会在挣扎演化张力的过程中，他们所走过的路。从历史中学习这个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一点。

Q: 请问怎样处理福音跟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

A: 如果一个教会只专注在社会影响而放掉福音信仰的基本的教义或者基本的立场，这个就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偏，而这种原初的异象，原初做社会参与的动机，热情就会慢慢的丧失，是走不远。这个是现代自由主义在西方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示，基本上来说自由主义的这些参与对社会造成了影响，但慢慢的基本上就去福音化了。比如说中国的每一个医院上面都有红十字标志，那么红十字显然是有教会的背景，但是现在哪一所医院跟教会有关系或者跟福音信仰有关系，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种痕迹了。但是反过来讲，只是一味的传福音而没有社会的参与，这就是很原始的步兵作战的方式。因为当我们传福音而不注重社会参与的时候，一些不信主有见地的人，他们办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培养接班人，他们的门徒培训比我们做得好多了。今天上面掌权的这一批人中能够使文革回潮，是因为当时上山下乡培养的那一批的门徒现在起作用了，所以你看这个门徒培训，对于这个社会是多么重要。门徒培训也许不是对社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一代人造就了一代人，那么整个社会在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些整体的制度性的教育，非洲有一句话说要培养好孩子要有一个村庄，而孔子也讲说里仁为美，孟母三迁，这些都是说周围的环境对人的模塑力是很大的。设想说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的制度，有很多的教会学校，而整个社会制度的设计受到基督教很大的影响，那么，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对于信仰，对于基督信仰都是正面的宣传，而不是现在这种非常负面的消极的宣传。事实上作为教会的工人去撒种之前，世上已经有人撒了很多稗子了，或者把整个心灵浇成水泥地了。加尔文的日内瓦那种社会制度或者说拜占庭的那个时代，一开始人好像就出生在这个基督化的家庭跟社会里面，

所受到的熏陶是自然而然的。人有两种信主的方式，一种是跟随父母而受到熏陶的影响，慢慢的在信仰的道路上追求；另外一种是所谓的 180 度转弯的那种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其实都需要的。一个星期前我在教“社会福音”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很多的美国学生他们是在信主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们对这个社会参与对一代人的模塑有很多独特的见解。大体来说这些年轻人认为制度设计，Social Engineering 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福音还是我们个人的心灵要跟上帝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个人性的悔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用社会福音来取代，中间确实是需要一个平衡的。